

语言

澳門思考：關於葡萄牙語言^{*}

羅世賢^{**}

我將永不孤單，假如
其他人與我一起追隨着我的
主張。

Rainer Maria Rilke

澳門是一個多元化的地方。

談及澳門的社會，便會想到它的文化、社群和種族，以至語言方面的多元化。

正由於這多元化使澳門成為一個政治、社會和文化均複雜的地方。

政治上複雜是因為澳門是葡萄牙政府管治下的一個中國地方。

在這政治空間裡存在着多個社群，或進一步來說，存在着多個權力中心¹。

• 葡萄牙共和國的葡萄牙人，他們擁有管治權力並且是直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前在澳門地區行使葡萄牙主權的正式代表；

• 澳門的葡萄牙人或稱澳門土生，他們一向在公共行政中擔當一定角色，並在中葡兩個單一語言的社群裡擔當着語言和文化的中介角色。他們認同自己是葡萄牙人，尤其認同自己是澳門的葡萄牙人。並由於這表面上的微小差別就造成完全的迥異；

• 澳門的華人，大部分是來自中國的移民，由於剛在本地區生根，所以沒有作為澳門居民的公民意識，儘管澳門的華人居民中有十萬人持有葡萄牙護照；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代表，他們擁有澳門地方主權的實際權力，而他們的言行舉動無論在管治上抑或在文化整合上對本地區的政治穩定都是重要的。

* 改自第十六屆《國際、文化和政治關係座談會》的講稿，該座談會於一九九五年五月二、三及四日在 Braga 的 Minho 大學舉行；大會主題是“亞太區——二十一世紀的盟主？”。

**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協調員

1. 摘自 João Pina Cabral，“九十年代澳門的新生活方式和價值”，刊於《社會剖析》雜誌，第二十八卷（總第一百二十一期），一九九三年（第二期），第四百零九至四百一十六頁。

澳門的社會和文化同樣是複雜的。原因是現存的種族社群從不會超越本身的語言限制，或至少以一共同的和必要的方式與其他語言的社群聯繫。

例如，澳門土生社群的成員，匯聚了馬葡、印葡、巴（基斯坦）葡、中葡等混血兒以及中葡與拉美或其他地方的混血兒，他們有意識地分擔一個共同的歷史和文化——澳門的歷史和文化，亦有意識地成為這個歷史和文化的真正繼承者，就是說有意識地成為他們很多時自稱為真正的大地兒女。然而，他們可以分屬於不同語言的社群。當向一名澳門土生問及他做夢時說何種語言，他答道：“如果是關於（公共）部門的事務，我會說葡語；如果是關於家庭的瑣碎事，則會說中文。”

例如，由澳門土生家庭成員選擇葡語或中文的教育制度就決定了他們選擇何種語言，亦因而決定了其世界建造的形式以及個性基礎的結構，意思是說，在世上有甚麼樣的因就有甚麼樣的果。

同樣在華人社群裡，其成員並不全是相同的民族或說相同的語言。但在華人的不同社群裡有個統一，那就是書面語，遠至公元前兩世紀的漢朝時代，這帝國在推廣漢語——漢朝語言時，情況就像羅馬帝國在其所有殖民地推廣拉丁字母一樣。然而這並不因此使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的口語變得相同或統一。

複雜的種族和語言現象在所有的大陸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國家中都是常見的。統一的語言和文化我們只能在兩個國家內遇上：葡萄牙和日本。

問題很少以公開形式和確切在國家問題方向上作討論，這給予距離葡萄牙一萬八千公里的澳葡當局在結束葡萄牙海外殖民圈的歷史任務上和《中葡聯合聲明》所訂定的過渡期內管治一個政治、社會和文化均如此複雜的領土上的角色和重大挑戰。

正因為缺少這方面的討論，故出現了葡萄牙語言和文化未來在澳門的問題。

眾所周知，葡萄牙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放棄行使本地區的主權。

同樣眾所周知，該主權於上述日期後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行使。

假如情況不是把一個中國地方的主權移交予一個已擁有其主權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是我們葡萄牙人，是這如此複雜的地區上單一進程的主角，如何複雜這之前我們已有提及，澳門地區主權移交的這個事實在亞洲歷史上是沒有甚麼特別的。

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往亞洲殖民地在移交主權予新的獨立政府的進程歷史。

過往殖民地移交主權予新的獨立政府的進程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個現象，並且幾乎在地球上所有大陸均曾出現。

一九四六年，英國政府頒佈“第一百九十七號殖民書”（Colonial Paper no.197）正式承認有需要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去面對戰後的殖民地。這種新姿態的言論集中在兩個主要的想法：在“英聯邦國家”（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的架構內發展殖民地自治和官僚本地化，而稍後，更把語言政策與之聯繫起來。

例如，在亞洲由本世紀初至今能保持獨立的只有兩個國家：日本和泰國。

而其餘的亞洲國家的政治 – 行政過渡進程都經歷了相同的現象和遇到了相同的問題：

- 政治制度的鞏固；
- 公共行政的本地化；
- 語言政策的建立。

澳門在形式範疇內亦逃不出這個規律：

- 逐步鞏固一個適合本地區實況的政治 – 行政制度，這大部分在《基本法》內已有所規定；

- 透過對本地年青公務員的學術和專業培訓的重大努力促進公共行政本地化，這些年青公務員將是行政當局的質量和運作的保證，使一九九九年後的運作不會出現斷層；

- 在公共行政內發展普及使用本地區官方語言——葡語和中文——的項目。這是因為，當中與葡語有關，在澳門有一個範圍廣泛的葡語文獻遺產——歷史、法律和行政方面，此等在一定時間內要求本地公務員有適當的科學和技術準備以便管理和保存這些遺產，亦要求部分公務員要有深入的葡語知識以便能完全分享這份遺產。

在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中²，我們提到一點，簡單地說，是有關葡萄牙語言在澳門的問題，這是葡萄牙遊客感興趣的，當他們抵達澳門隨即發現葡萄牙語言在民間的使用並不普及。

在提及的文章裡，我們指出葡語在澳門不普及的內外原因。

還指出澳門作為具歐洲色彩的港口城市的建立和長治久安的特徵，這些特徵主要是由葡人創造的，而在教授 Luís Filipe Barreto³ 博士的優美文章裡對這些特徵描寫得十分好，特別是：“匯聚共同的風險、利潤和利益的地方”，“在緩和衝突策略下交匯”以及“變化的策略”和“與其他東方文化同化和融合的能力”等等，同時，在實際上沒有條件作他選以及在一個自然形成的雙語社會的情況下，使葡語成為溝通和教育的語言。

正由於缺乏語言政策導致葡語在澳門的中小學校的不普及。正如所知，亞洲的英國殖民地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就考慮到語言政策，而澳門只在不久前才想到並開始發展。然而，主要是從公共部門和公共教育機構，特別是高等教育機構着手。

誠然，語言政策的鞏固由始至終應由教育制度內着手。但事實上，在很長的時間裡缺乏在早應採用強制學習葡語和中文措施的教育制度內展開持久的推廣，因為行政當局在財政上予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寬大，給予它們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來開展這項工作。但在行政當局內對中葡語的使用亦缺乏普遍性，在這方面，必須透過在公職職程中訂定入職和晉升所需的語言水平，使工作人員有精通語言的能力。

2. 羅世賢，“澳門高等教育之認可”，《行政》雜誌，第八卷，總第三十期，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3. Luís Filipe Barreto，“澳門——歷史文化分析的要素”，《行政》雜誌，第八卷，總第三十期，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事實上，由一九九零年起澳門行政當局就有規範，規定各類公職職程的入職和晉升所需的中葡語言水平。公佈這些規範有正面的效果，有趣的是沒有強制實施這個法規，亦極少這樣做。但由於心理效應在這方面產生了大量需求，大部分是由政府工作人員自發作出的，無論是學習葡語抑或學習中文亦然。他們深信如此將可以在其有關職程中的發展帶來方便，儘管對於這類自發的努力沒有客觀保證。

澳門的政治－行政過渡的程序帶來了在公共行政內普及使用本地區官方語言中的葡語的問題，這個問題經常與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其他三大問題：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法律中譯連在一起。

在我們上一篇文章內提及在葡萄牙大概還沒有明白到《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九條規定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目的。

一九九二年三月，在我們參加《澳門語言國際研討會》⁴上我們講到西方社會的公民之間有着普遍的觀念，就是單一語言制是大部分民族溝通的普遍方式。而這種觀念是由政府把語言政策制度化地推廣，現況是世界上少於四分之一的國家承認兩種官方語言，亦只有六個國家承認三種或以上的語言為官方語言。

然而，如果我們留心每個國家或地區的語言實況多於其語言政策時，我們會發現實況有很大的差異。我們肯定不會遇上一個完全單一語言的國家，除了葡萄牙——雖然存有Mirandês（中部，邊界地區及南部或 sendinês），Guadramilês 和源於十二世紀萊昂的 Riodonorês 等方言——及日本，有趣的是在日本最北最寒冷的北海道，也有一種Ainu 的語言。

例如，西班牙從來沒有承認泰羅尼亞語（catalã）、加利亞方語（galega）或巴斯克語（basca）為官方語言與卡斯蒂利亞語（castelhano）相提並論，它們只作為地區語言，儘管說這三種語言的人數眾多並在日常生活中被廣泛使用。這種情況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在澳門的葡語上出現。

事實上，澳葡當局將使中國當局了解到澳門的單一性和未來的延續是必須透過保持葡語的官方地位。

賦予葡語這樣的地位，重要的是不想脫離澳門的法律體系，眾所周知，澳門的法律體系屬葡萄牙的模式，這情況將至少繼續至二零四九年。這些在《聯合聲明》附件一第一部分已隱然落實了，雖然，在上述的日子之後和隨着時間的推移，澳門的單一性不會成為中國偉大祖國中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一種單一性文化。

因此，由現在開始，有較找出導致在澳門會說葡萄牙語人數百分比低的禍首及原因，或較指出澳門行政當局成功地履行《聯合聲明》的目標所遇到的各種困難更為緊急的事情要做。而《聯合聲明》本身就規定要普及澳門的官方語言，尤其是葡萄牙語言。

今天，重要的是尋找途徑使將來的澳門成為在中國這大國，以至亞洲地域內的拉丁文化小島，但不是因為會說其語言的人數的迅速增長（這是某些人的豐富或虛幻

4. 羅世賢，“一國兩制、一地多語”，《行政》雜誌，第十六期，第五卷，一九九二年八月。

的想法)而是由於我們致力保存葡國主導的法律體系的實行,及在文化方面我們曉得利用學術渠道,特別是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來推動拉丁語言和文化的研究及教授,尤其是葡萄牙的語言和文化為主的研究及教授。

正如我們在上篇文章(參閱註4)提到,澳門是具葡萄牙法律模式的都市,為了使之延續下去,必須為法律範疇和公共行政建立一個清晰的結構(當然,亦應包括葡萄牙語言及文化研究的發展指引),至少,希望本地區由中學教育制度的九年班開始便加入這項計劃。

無論是對於那些接受把這學科拼入其課目的學校,還是對於那些選擇在知識領域中要求精通葡語作為學術工作主要語言的學生來說,這將是被大力支持且並非靠財務誘惑的一項計劃。這項計劃在公共制度市場學上亦將是有創意和深思熟慮的。

此外,亦要對中葡教育作重整,使之學習具有同等地位的屬本地區官方語言的葡語。

如此,才可以想及一個有效的聯繫,把本地區的某些學校的某些具十二年級學歷的學生與澳門法律或公共行政的教育和實踐銜接,以至與澳門或葡國的法律學院銜接。只有如此,澳門地區的葡國模式法律體系才得以維持下去。

儘管深信未來十年,在法院、登記局和立契官公署中澳門法律會轉為以中文主導。然而使用澳門的葡國法律的中譯版本,或者說由不理解法律的源流、規條和司法見解的“法律操作者”控制。因此,使產生法律的模式黯然失色。奇跡的日子將出現;當澳門法律操作者在做夢時曉得本地區兩種官方語言,亦懂得立法成品的兩種語言。

這一切肯定不會從澳門大學開始,主要會透過一年預科學習,改善現有的學習計劃,使所有不懂葡語的學生獲得學習上所要求的葡語水平,尤其達到以葡語教授法律課程的要求。

作為中國這大國的一個文化城市,澳門意識到將可以扮演中國和整個東亞與歐洲南部、非洲葡盟和法盟及拉丁美洲等拉丁世界的重要橋樑角色。拉丁橋樑其語言和文化自然是以葡國的語言和文化為主,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科學和技術交流的有利條件⁵。

另外,要提醒大家葡語是世界第六大的世界語言,與第五大極為接近。同時,可能是唯一仍在快速增長的,試想在以葡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如安哥拉和莫三鼻及的人口增長的巨大潛力,及其後將受葡語教化。

這是一個語言大國在那裡我們可以推動或傳達不同的知識,特別是葡萄牙自身的語言和文化。

在教授和研究葡萄牙語言和文化方面存在着一個龐大的就業市場,而現在或將來的澳門正包括在內。

5. 汪海,“澳門:中國和拉丁世界交流的橋樑”,《行政》雜誌,第十五期,第五卷,一九九二年五月。

在某些情況，特別在澳門、果阿、馬六甲和斯里蘭卡的一些小社群保存葡萄牙的語言和文化，和在其他地方如中國、日本、韓國、泰國和緬甸推廣葡國的語言和文化，將予葡萄牙共和國有作出投資的空間。必須使葡國恢復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耶穌會教士的經歷，從澳門出發分道前往中國和日本：沿着商業航線的足跡尋回知識和誇文化交往的文化⁶。

為此我們必須模擬遺忘已久的旅程，再度展開旅程，喚起海上貿易，及在亞洲取得我們的經濟空間，這一日標我們許多歐盟夥伴已成功地在差不多全部的亞洲國家做着，尤其是在那些昔日葡語是通用語言的國家。

因為，在我們葡人之後，不同知識和誇文化交往的冒險已成為一自然的途徑。我們為文化接觸作了先例，而今天我們亦曉得隨着時間對之作出重整。同時重回那些有着我們共同歷史的地方，葡萄牙語言和文化正是我們所擁有能讓我們回到在歐洲的發祥地的珍貴所需。

此外，或許當與其他民族接觸，特別是與非歐洲人的接觸時，葡萄牙人的目的似乎為了確認自己是真正的葡萄牙人和為了尋回自己身份的意識，或至少加深這意識。正如José Mattoso教授在其優美文章是葡萄牙人所說“事實上，葡萄牙人身份的意識好像是編造出來的尤其在接觸其他民族時”。

葡人似乎有目的地留下交往的空間。只有如此想法才明白到為何今天在亞洲的某些國家如印度、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和帝汶等地仍在說葡語，又或是今天仍用心與葡萄牙人保持友誼，日本的南部便是一例，一個十五世紀夢想的奇跡，它有別於現今葡國對外政策的本質。

澳門葡人和在澳門的葡人，他們有特權在結束源於十五世紀的葡萄牙歷史日程的殖民圈時刻扮演角色。一個由三大挑戰組成的歷史終結：

-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政權移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在澳門留下一個有效率和具質素的葡萄牙模式的行政當局，而不會在運作及質量上出現斷層且由適當具有所需的多語能力（葡語、普通話、廣州話和英語）的澳門居民自行管理；

- 同時，對於各類重要的文獻遺產，特別是澳門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作出本地化和翻譯成中文；

- 最後，是保留葡萄牙人所建立及生活中每天不斷鞏固的精神和方式，意即在聯繫各種文化之間作了開首“以使每種文化對別的作出全面的貢獻”（Claude Lévi-Strauss）。換句話說，在中國的這一角落保留葡萄牙當局，在優良的歐洲傳統下帶來並促進對公民的權利、自由的尊重和保證。這些都是聯繫不同社會的原則，與很多亞洲的其他社會所實行的不同。

然而，以一個符合將來的政治和社會實況的架構為九九年後葡萄牙人繼續留在澳門而重新定位是重要的。葡萄牙的語言和文化在澳門和在亞洲的延續應是二十一世紀的新國家計劃，因為二十一世紀將是亞太地區的世紀。

6. 黎祖智，“二十一世紀的東西方關係”研討會開幕演辭，澳門大學，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九十年代的澳門，時間的觀念及其管理有別於已制度化國家沒有時間限制的觀念，或有別於使我們有長久共處的虛幻觀念。在澳門時間的管理要考慮到一個已訂定的橫向時間，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亦要考慮到在葡萄牙海外殖民圈最末階段裡一個葡萄牙至今未盡的歷史責任。

是一個迥異的單一時刻，當然要完全理解澳門的實況又或要葡萄牙在瞬間體會，特別是對那些沒有或不曾尤其是在此歷史時刻在澳門居住的人來說並非易事。

而葡萄牙，特別是葡萄牙各個知識領域的科學團體與多語言和多文化的澳門接觸更是不可缺少，以便澳門能對在葡萄牙報章頭條及那些曾造訪本地區的人士的國家計劃政策演辭中的不光彩稍作改善。

澳門是和睦共處的單一地方。在某種形式上，是人類未來發展典範的縮影：凝聚不同源流和不同文化的人類互相依附的表現；放棄人與人之間把世界劃分疆界和敵友的固有主義，有利於心連心把地球建成友誼的統一體。

因此澳門可以鞏固匯聚誇文化的意念，及在規劃全人類的價值與權利的藍圖上鞏固將來繼續是具有西方和葡萄牙模式的一個東方計劃的意念。

